

超时工作的社会性后果：基于 CGSS2013 的实证研究*

王琰

摘要：本研究基于时间研究和劳动过程理论，认为超时工作反映了劳动者逼仄的时空体验，形塑了人们整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对 CGSS2013 数据分析表明，超时工作挤占了个体自我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时间，使劳动者饱受身心健康的困扰，相互依存的社会联系被破坏，质疑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无暇顾及自身之外的外部环境问题。上述影响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这些后果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超时工作使劳动者被异化为资本实现的工具，身而为人的多元面向和丰富意义全面塌缩。

关键词：超时工作 劳动过程 时间研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不平等与环境问题交互影响和缓解机制研究”(21CSH023)阶段性成果。感谢王庆明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作者简介：

王琰，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社会不平等。邮箱：wang-yan@nankai.edu.cn。

The social outcomes of long working hou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2013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Yan W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time study and labor process theor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overtime work essentially reflects workers' experience of compressed time and space, and fundamentally shapes the surrounding social settings. Multivariate analyses of data from CGSS2013 show that overtime work compresses workers' leisure time which could have been used for self-develop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eads to a variety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across different classes outside the labor process, including the weakening of social capit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damage, negative evaluation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the society, and the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overwork alienates workers as a tool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rodes the profound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Overwork; Labor process; The sociology of time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劳动者超时工作现象逐渐受到人们关注,工作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六天的“996”现象成为线上线下的热议话题。2016年,媒体曝光某互联网公司全员实行“996”工作制度。虽然当时受到舆论的口诛笔伐,但加班之风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2019年,程序员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发布了“996.ICU”项目,提出“工作996,生病ICU”的口号,揭露和抵制实施996工时制度的互联网公司,我国多个互联网公司上榜。互联网企业之外,多个行业也先后被曝光实施超时加班制度,超时加班对劳动者休假权益和生活的负面影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共鸣。

学术界对超时工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时间社会学和劳动过程两个研究领域。时间社会学认为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时间的使用和分配是权力博弈平衡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对时间使用方式的分析理解社会实践,将宏观社会历史结构和微观生活体验相连接。研究者重点关注了标准工作时间制度对社会时间的切割以及对人类工作和生活的规训,并进一步考察了现代社会中时间加速趋势造成的普遍的压力感受和功利主义困境。劳动过程研究认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雇佣者存在拉长劳动时间的天然趋势,劳动者经历了从被动控制到主动参与的多种劳动控制手段,在更加隐蔽、竞争性更强的劳动控制过程中,劳动者的身体、情感和社会关系过量卷入到工作中。

本研究继承并拓展了时间社会学和劳动过程研究的分析视角,认为超时工作表面上是工作时间的扩张,实质上反映了劳动者逼仄的时空体

验，进而塑造了人们整体的社会生活图景。这种时空体验使超时工作相对无差别地影响了参与者，跨越了阶层的樊篱，体现出普遍性的特征。在上述理论和社会资本、健康研究、环境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中层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分析，探讨超时工作对劳动者工作之外的生活场域造成的影响，揭示超时工作造成的更综合的社会后果。

本文希望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现有讨论做出贡献。学理意义上，大多数劳动过程研究聚焦于劳动场域本身，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场域之外的影响。同时，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关注受雇佣群体如何受制于无处不在的劳动控制。在时间社会学研究范畴中，虽然研究者明确指出时间使用是理解个体经验和社会经历的重要切入点，但对于超时工作对人们生活的具体影响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本研究结合两个理论框架，一方面延伸了劳动过程研究，将超时工作看作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和结果，认为在经济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今天，超时工作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场域，而是溢出到个体生活的诸多方面，丰富了劳动者的主体性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内涵，将时间使用的后果具象化，分析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对生活各个方面造成的具体影响。

现实意义上，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质需要，而是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工作领域中，以往延长工作时间、忽视工作效率的粗放发展模式极大地背离了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焦虑，激化了社会矛盾。本研究希望回应这一现实关切，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平衡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文献综述

(一) 时间社会学视野下的工作时间变化和个体生活体验

涂尔干(1995: 9-10)提出时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们在共同的时间框架内展开集体行动,形成集体共识。人类生活在时间中,时间就构成了人的存在维度和组织人类生活的必要要素,人们依据时间协调自己的日常活动和人际行为,时间安排方式构建起身份和自我认知(林聚任、王兰, 2015; Thoemmes et al, 2020; 郑作彘, 2018b)。时间的使用同时串联起广阔的社会历史结构和个体微观体验,是不同主体之间博弈平衡的结果。

事实上,工作时间一直是时间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研究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时间标准化和商品化过程对社会时间的重塑,时间从前现代模糊的自然状态细分为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资本家以此管理劳动过程。时间规训从生产领域弥散并内化到生活领域,最终全面影响了社会运行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息(Nyland, 1986; Schor, 1991; Thompson, 1967)。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时间就成为抽象劳动力得以换算为具体价值的重要媒介,人不过是时间的体现,工人贩卖劳动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贩卖自己的工作时间(成伯清, 2015; 郑作彘, 2018a)。时间就是金钱,资本家以时间为工具对工人进行管理,工业革命以来工作时间持续延长,高峰期比工业革命之前高出50%以上(Schor, 1991: 44),工作时间成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权力斗争的关键领域。韦伯从理性化的世俗伦理角度分析了天职观,认为在新教伦理的驱动下,人们超越了传统主义慵懒散漫的劳动态度,把工作当作绝对目的本身,即“天职”来做,这种天职思想和为

劳动献身的精神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要素（马克斯·韦伯，2019）。天职观要求人们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时间，损失时间被视为致命的罪恶，浪费时间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哈尔特穆特·罗萨，2015）。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思想家越来越意识到工业社会不仅仅带来了时间的标准化，同时也造成了时间的加速化和碎片化。波德莱尔（2008）将现代性描述为过渡的、短暂的和偶然的时间状态，齐美尔（1903）在分析都市时重点探讨了不断变化的紧张的都市生活对现代人造成的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释，分析了信息社会背景下工作时间的灵活和弹性化趋势，强调弹性时间对社会行动造成束缚和解放的二重性特征。哈维（2013）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发现为适应市场波动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从福特主义过度生产积累走向后福特主义下的灵活积累的弹性生产方式，周转时间加快，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也呈现出弹性化特征，人们生活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在加速流动过程中被全面挤压，造成“时空压缩”现象。贝尔（2018）提出现代信息社会物资丰饶的背后是时间的付出，由此引发广泛的时间匮乏。卡斯特（2010）也认为在信息化的网络社会中，工业社会中有序的钟表时间（clock time）通过压缩和模糊的过程被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所取代，社会实践越来越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罗萨（201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晚期现代社会中线性时间终结，工作时间不再遵循固定时间表，而是呈现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个体行动者不得不面对时间加速带来的不确定性。

研究者没有将分析止步于社会时间形式的变化上，而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这种变化下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怀。韦伯虽然高度评价了天职观

在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方式上的作用，但也看到在后期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天职观的宗教色彩逐渐褪去，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认为只有专门化的工作才有价值，全面断绝了浮士德式的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斯·韦伯，2019）。卡斯特（2010）观察到无时间的时间使人们蜂拥着在更少的时间做完更多的事，传统上工作时间、个人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区分被信息通讯技术彻底瓦解，体现出人类面临的深刻困境。罗萨（2015）认为，当代社会时间同时体现出加速和停滞的特征，人们流连于五光十色的感官刺激，但又无暇深刻感受这些看似丰富的体验，造成实质上个体经验的贫乏和压力的加剧。

时间社会学家注意到了当代社会的工业时间从标准化向弹性化的变化，也关注到工作时间对于人们整体生活感受的深刻影响。分析对象也从早期的工人群体向普通民众扩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分析的范式。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上抽象意义的理论探讨，我们对于工作时间到底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哪些方面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仍然缺乏清晰的了解。下面笔者将借鉴劳动过程研究的发现，深入到工作场所内部，探究超长工作时间如何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多个场域。

（二）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

对劳动控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2018）在考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发现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丧失了控制权，资本控制了劳动过程，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尽可能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特别注意到资本家存在使工人过度劳动的天然趋势，“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马克思，2018：101）。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细化劳动过程实现概念和技能的分离，劳动者被“去技术化”，成为只会重复简单工作的工具（哈里·布雷弗曼，1978）。劳动过程控制了人，劳动力虽然分化为蓝领和白领阶层，但作为劳动工具，二者的劳动过程和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劳动控制历经简单控制和技术控制，直至现在的科层制控制（Edwards, 1979）。其中，科层制控制以规章制度的面目出现，将资本权力制度化地嵌入在公司的社会和组织结构中。工作场所中的等级关系变得抽象化和非个人化（impersonal），劳动者可喘息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劳动控制呈现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倾向，劳动者的工作深刻地塑造了他们各个方面的行为表现（Edwards, 1979：148）。员工自发地遵循企业要求，将企业价值内化为个人行动准则，这种“模范员工”的形象被高度赞扬，模糊了员工作为全面的人的其他面向。劳动控制并不是只通过强制（coercion）来实现，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推行赶工游戏、建立内部劳动市场和巩固内部国家（internal state）的多元控制手段，建立生产中的霸权体制，促进劳动者“自发的奴役”（Burawoy, 1985；迈克尔·布若威，2008）。

如果说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强调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后期研究者则逐渐揭示出劳动控制的复杂过程，资本通过更加隐蔽的管理手段诱使劳动者主动参与到劳动控制中，工作时间也不再只是资本家主导下的被动拉长，还加入了劳动者彼此竞争形成的主动加码。劳动者对工作身份的认同和经济竞争规则的内化在主动性的掩饰下实质上弱化

了他们的谈判能力，使劳动者丧失了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流程的掌控。他们不再被表达为阶级集体当中的一员，而是在个体主义的掩饰下作为单独的竞争性的个体行动者参与劳动。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在工作场所中时刻保持在场（being physically present）的方式彼此竞争，提升自己的绩效表现（Perlow, 1999）。

现代社会中，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成就，工作时间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在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下，其他社会时间只能见缝插针，在工作时间留下的越来越小的缝隙中寻找空白（Thoemmes et al, 2020）。经济关系对其他生活场域的支配性也使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主观体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劳动者在赶工过程中积极追求大量工作任务和目标的完成，在这种过程中身体、情感和社会关系过量卷入，造成客观上休闲时间减少、工作时间延长的时间约束和主观上疲惫无力、紧张焦虑的时间感受（王宁，2013；贾文娟、钟恺鸥，2018）。时间社会学研究以超越阶级的时间为介质，分析时间使用对生活造成更广泛的影响。两个理论框架彼此互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超时工作如何刻画了普通民众在劳动场域之外的生存状态。下面将在时间社会学和劳动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对相关中层理论进行讨论，分析超时工作对人们生活可能造成的具体影响。

（三）超时工作的社会性后果

超时工作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休闲性社会交往的减少。在朝九晚五的标准工作时间制度下，人们的时间安排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可以据此协调工作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在共同的自由时间内进行社会

交往，建立社会联系。然而，在时间加速和弹性工作时间的背景下，超时工作一方面带来自由时间的缩短，同时也导致自由时间边界的模糊，人们常常无法预知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时间何时能够开始，又在何时结束，时间协同社会行为的功能被弱化，难以组织起有效的社会互动。社会加速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使工作之外社会关系的发生陷入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当中，行动者的行为无法保持同步，导致个体身处在一个自身行为无法获得响应的生活世界里，这也阻止了人们发展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深度融入的经验，形成普遍的疏离体验（哈尔特穆特·罗萨，2015）。经验研究发现，过长的工作时间确实造成了时间挤压，导致非工具性的社会交往水平下降（Bartolini & Bilancini, 2011）。即使是自主性较高的管理层，近八成的被访者也报告了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他们的社会交往造成的负面影响（Worrall & Cooper, 1999）。基于上述论证，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超时工作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作时间越长，一般信任水平越低，社会交往频率越低，

超时工作给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和证实，具体来看，超时工作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影响健康状况。首先，大量时间用于工作，缩减了原本可以用于从事健康活动的时间，不利于身体的休息和恢复。实证研究表明，加班时间越长，人们越容易经历睡眠剥夺、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烟酒消费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快餐等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从事运动的频率越低（Afonso et al, 2017; Artazcoz et al, 2009; Fan et al, 2015; Fletcher et al, 2005; Loh, 2009）。加班时间还会带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资本的减少，从而弱化社会联结，

引发孤独感，并降低自尊水平，从整体上影响了健康状况（Helliwell & Putnam, 2004; Presser, 2003）。

其次，加班时长是劳动控制的重要体现，在实施全面和严密劳动控制的工作场所中，虽然控制的形式往往是隐蔽的，但劳动者感受到的压力和疲惫等健康代价却是真实的。对我国劳动者的调查显示，从被视为传统工人群体的流水线工人和建筑工人，到新型平台经济下看似自由实质上经历严格时间控制的外卖骑手，再到知识技术相对密集的程序员群体，他们大多都陷入在全方位监控体系下碎片化劳动控制、议价能力被严重削弱的境地，存在着普遍的超时工作，并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紧迫感和无力感，造成抑郁、焦虑、精神失调等健康问题（陈龙，2020；李强、刘杰，2020；李胜蓝、江立华，2020；刘程，2017；潘毅，2011；张抗私等，2018；郑广怀，2010）。

第三，长时间处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条件恶劣的工作场所还会造成职业暴露，引发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等问题（Jorgenson et al, 2020; Kauppinen et al, 2000）。Kivimäki 等基于 60 余万人数据的元分析发现，过长的工作时间提高了心脏病和中风发生的概率（Kivimäki et al, 2015）。另一项元分析探讨了更广泛的健康后果，发现工作时间过长与抑郁、焦虑、睡眠问题和心脏病等状况高度相关（Bannai & Tamakoshi, 2014）。在工作时间降低到每天 6 个小时之后，人们的睡眠状况、压力水平、记忆困难、负面情绪、疲乏劳累等问题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Barck-Holst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假设是：

研究假设 2: 超时工作与健康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作时间越长，健康状况越差。

超时工作除了对个体行动者带来社会资本和健康上的直接损害，还可能引发其他存在负面外部性的行为特征，其中，超时工作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受到环境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提出了下面两种解释。规模效应（scale effect，也被称作“财富效应”）的解释认为，在现行工作体系中，工作时间更长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但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又侵占了自由时间，使人们没有时间去从事更加丰富的闲暇活动。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推动下，购物成为主要的休闲活动，人们陷入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的怪圈，从而引发过度消费等环境不友好行为（Schor, 1991）。

成分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的解释认为，在经济制度成为支配性制度的现代社会，工作时间的安排决定了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一方面，自由时间的匮乏使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节约时间成本的生活方式。但是，亲环境行为通常表现为经济成本较低的时间密集型活动，例如，与垃圾混合投放、乘坐私家车、选择外卖饮食、使用一次性产品等相比，垃圾分类、利用公共交通、在家烹饪、循环回收使用物品无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除了节约时间的实际考虑，缺乏自由时间的群体往往选择通过炫耀性消费标记和识别社会地位（Fitzgerald et al, 2018; Knight et al, 2013）。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理论，工作时间越长，人们进行资源和能源密集型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频率越高，参与亲环境行为的频率越低，生态足迹越高（Devetter & Rousseau, 2011; Kasser & Brown, 2003; Schor, 2005）。基于此，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是：

研究假设 3：超时工作与亲环境行为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作时间越长，亲环境行为水平越低。

在弹性化的时间结构中，人们更加追求“时间富裕”，强调时间使

用上的“质”的提升，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生活。时间的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时间自主性的实现需要由时间协调上的平等性和公平环境加以支持（郑作彘，2018b）。时间分配与物质分配具有同等重要性，是现代社会中公平感的重要来源。王宁（2013，2015）提出，在我国，超时工作具有深刻的制度结构性根源和文化根源。我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劳动过程经历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双重剥削，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支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生存压力加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庇护模式下的平等主义式微，市场竞争加剧了社会分化，个体价值在差异化的结果中得以体现，迫使人们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同时传统的面子和人情文化使雇员面对上级加班的要求时即使不愿意也无法拒绝，强化了不公平的时间分配。

收入差距评价是民众对收入差距的社会反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刘欣、胡安宁，2016；魏钦恭，2020）。政府评价体现了民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裴志军、陶思佳，2018）。实证研究发现，生活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其引发的不公平感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使人们质疑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质疑政府在分配资源和协调利益上的意愿和能力，认为政府不愿或是无力提供公平的社会服务，降低了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破坏了对政府的信任，从而给出负面评价（麻宝斌、马永强，2019；田丰、孙正昕，2016；魏钦恭，2020；张辉，2016；朱志玲，2018）。结合上述文献，笔者认为，超时工作本质上体现了时间分配上的不公正性，是不公平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评价。

研究假设 4: 超时工作与社会分配公正性评价存在负相关关系, 工作时间越长, 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评价越低。

时间社会学的近期研究突出了后工业时代里时间的加速化和碎片化趋势, 劳动时间使用实质上反映了人们整体性的劳作状态, 时间流逝的客观性使其影响普遍存在于所有阶层的超时劳动者中, 因此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分析框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各阶层参与超时工作的人群可能会表现出相似的社会性后果。

研究假设 5: 上述关系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虽然上述研究假设的具体指向有所差别, 但本质上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母题: 或主动或被动的超时工作意味着时间紧张和无所不在的劳动控制, 工作时间挤占了个体自我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时间。正如马克思(2014: 48)的评价,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 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 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劳动者被异化为资本实现的工具, 饱受身心健康的困扰, 相互依存的社会联系被破坏, 对社会分配怀抱不满情绪, 无暇顾及自身之外的外部环境问题, 身而为人的多元面向和丰富意义塌缩甚至被全面消解。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

中国综合调查是在我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型调查项目, 调查总体是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涵盖了本研究所需的所有相关变量,因此使用该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中包含来自我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11438名被访者,因为本研究关注工作时间的影响,所以仅保留了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从事非农工作的4282名劳动力,去除其他控制变量缺失值后,共有3946名个案进入分析样本。因为涉及到选答问题,因变量缺失值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实际模型中的样本量略有区别。

(二) 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超时工作。我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出于生产经营和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同时,劳社部《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规定,月工作日为每月20.83天。CGSS2013中询问了劳动者上周的工作小时数,考虑到样本中每周工作小时数均值已达51个小时,远超过44个小时的规定,笔者结合上述法律法规,使用每月36个小时的加班上限对超时工作进行操作化,将上周工作时间超过51个小时($= (20.83 \times 8 + 36) / 4$)定义为超时工作。

为了检验阶层差异,笔者使用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作为阶层的操作化指标,取值从1到10(1=最底层,10=最顶层)。

因变量上，社会资本涵盖认知和结构两个维度，其中认知维度是指社会信任水平，结构维度是指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状况（Portes, 1998; Putnam, 2000）。问卷中有两道题目涉及了信任情况，分别是“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和“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回答选项为1到5的里克特量表取值（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遵循既往研究惯例（Jin, 2013; Taniguchi & Marshall, 2018），我们将第二个变量反向编码，然后将两个变量加总取均值，得到社会信任变量，取值越高表示被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CGSS2013中分别询问了被访者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社会交往频率，我们使用这三个变量作为对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测量，数值越高表示交往越频繁。

笔者用两个变量衡量个案的身体健康状况，第一个是自评健康，即“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1 = 很不健康，5 = 很健康）。第二个变量是活动能力，使用问题“在过去的四周中由于健康问题影响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1 = 总是，5 = 从不）进行测量。抑郁程度变量取自问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1 = 总是，5 = 从不）并进行反向编码，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的负面情绪水平越高。

数据中包含以下九个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问题，对应取值从1到3，依次为“从不”、“偶尔”和“经常”：（1）垃圾分类；（2）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3）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4）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5）为环境保护捐款；（6）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7）积极参加

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活动；（8）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9）自费养护树木或绿地。笔者通过加总取均值的方法得到亲环境行为变量（ $\alpha = 0.75$ ），取值越高表示从事亲环境行为的频率越高。

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评价从经济资源和政府公共服务两个维度进行操作。对经济资源分配的满意度使用收入差距评价变量进行测量，取自问题“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取值从1到3，依次为“合理、可以接受”、“不合理，但可以接受”和“不合理，不能接受”，将取值反向编码，得分越高表示对收入差距的容忍性越高。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来自被访者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的满意度，取值从1到5，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由于两个变量来自B卷选答部分，因此样本量较小。

控制变量上，首先我们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基本人口学变量，性别被设置为虚拟变量（1 = 女性），年龄为连续变量，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1 = 已婚）。由于既往研究发现年龄与社会资本、健康等多个因变量存在非线性关系（Helliwell & Putnam, 2004），笔者将年龄的平方项也纳入了分析模型。教育程度为一组虚拟变量，依次表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及以上。收入为被访者去年全年职业收入（元），为纠正右偏分布，分析时使用了收入的对数形式。户口为虚拟变量（1 = 非农业户口）。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管理权限是影响劳动过程的重要指标，因此也在研究中加以控制，设置为一组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只管理别人，不受别人管理”，“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和“既不管理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四种类型。单位类型是一组虚拟变量，依次是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无单位/自雇/自办(合伙)企业。表1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结果。

表1 描述性统计值 (CGSS201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样本量
因变量				
社会信任	3.05	0.78	1-5	3946
社会交往(亲戚)	2.35	0.69	1-5	3934
社会交往(朋友)	2.62	0.82	1-5	3942
社会交往(邻居)	3.81	2.01	1-7	3946
自评健康	4.12	0.85	1-5	3944
活动能力	4.35	0.78	1-5	3934
抑郁水平	1.90	0.89	1-5	3936
亲环境行为	1.65	0.37	1-3	3946
收入差距评价	1.84	0.65	1-3	1809
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	2.77	0.91	1-5	1968
自变量				
超时工作	0.40	-	0/1	3946
阶层	4.58	1.61	1-10	3946
性别(1=女性)	0.39	-	0/1	3946
年龄	39.78	10.52	17-64	3946
婚姻状况(1=已婚)	0.83	-	0/1	3946
小学及以下	0.13	-	0/1	3946
初中	0.30	-	0/1	3946
高中/中专/技校	0.27	-	0/1	3946
大专及以上	0.30	-	0/1	3946
收入(元)	37831.95	42828.70	0-1000000	3946
户口(1=非农业户口)	0.52	-	0/1	3946
只管理别人,不受别人管理	0.07	-	0/1	3946
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	0.17	-	0/1	3946
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	0.56	-	0/1	3946
既不管理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	0.20	-	0/1	3946
党政机关	0.04	-	0/1	3946
企业	0.45	-	0/1	3946
事业单位	0.12	-	0/1	3946
社会团体	0.03	-	0/1	3946
无单位/自雇/自办(合伙)企业	0.36	-	0/1	3946

（三）分析方法与稳健性检验

首先，根据因变量的情况，本研究分别选择了 OLS 线性模型和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考察超时工作这一虚拟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各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均值在 2.86 到 2.95 之间，远低于经验原则的阈值 10，绝大多数方差膨胀因子低于 4。同时，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都低于 0.2。这些都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次，考虑到劳动法规定了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笔者还采用 44 小时作为区分是否超时工作的临界点，控制其他变量后，超时工作虽然仍然对与亲戚的社会交往和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他结果与后文汇报的结果基本一致。

再次，自评阶层是受访者对自己所在阶层的主观认知，为了更好地测量客观阶层差异，笔者还检验了超时工作的影响是否存在教育、收入、管理职责、工作单位上的差异（结果可联系作者索取）。与正文汇报的结果相似，虽然个别模型存在阶层间显著差异（如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但绝大多数不存在明显差别，没有观察到不同阶层群体参与超时工作后显示出不同的结果。

最后，笔者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解决样本分布在劳动时间上由于成就动机、个体特质、工作性质等造成的选择偏差，根据倾向得分对样本进行匹配，使干预组个体和控制组个体尽可能相似，从而缓解选择偏差问题（Guo & Fraser, 2015；苏毓淞，2017）。具体操作上，首先基于已有的控制变量，通过逻辑回归模型预测了个体超时工作的概率。相比其他匹配方法，核匹配法对于每个控制组个体与任一干预组个体之间距离的调整更加合理，因此研究使用了这种方法进行匹配，结果通过了平

衡性检验。为得到正确的标准误估计值,使用自助抽样法进行估计($n = 50$)。最后基于匹配后样本进行了因果系数估计。考虑到不同匹配方法可能带来结果上的差异性,笔者还使用了1:1邻近匹配法、卡尺范围内($\epsilon \leq 0.25\sigma$)的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等多种方法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推论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研究结果

表2展示了衡量超时工作对社会资本影响的OLS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其中模型1a到模型4a考察了超时工作对社会资本在一般性影响,模型1b到模型4b加入超时工作和阶层的交互项,考察超时工作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否存在阶层差异。模型1a和模型1b的结果显示,超时工作对社会信任没有显著影响($b = -0.037, p > 0.1$),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b = 0.019, p > 0.1$)。模型2a到模型3b显示,超时工作虽然对社会信任没有影响,但显著降低了与亲戚($b = -0.080, p < 0.01$)和朋友($b = -0.080, p < 0.01$)的交往频率,且对应的交互项都不显著,说明这种负面影响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中。模型4a发现,在不区分阶层时,超时工作对与邻居的社会交往频率没有影响,但是在模型4b中加入交互项后,发现超时工作对邻里交往的关系实际上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控制其他变量后,超时工作降低了低阶层群体与邻居交往的频率,强化了高阶层群体与邻居的互动。总的来看,假设1得到了部分支持。控制变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已婚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水平更高。

表 2 超时工作对社会资本影响的 OLS 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CGSS2013)

	社会信任		社会交往 (亲戚)		社会交往 (朋友)		社会交往 (邻居)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超时工作	-0.037 (0.028)	0.002 (0.075)	-0.080** (0.025)	-0.165* (0.065)	-0.080** (0.028)	-0.152* (0.075)	-0.085 (0.071)	-0.610** (0.188)
阶层	0.040*** (0.008)	0.044*** (0.010)	0.033*** (0.007)	0.024** (0.009)	0.031*** (0.008)	0.024* (0.010)	0.046* (0.020)	-0.006 (0.026)
超时工作 × 阶层	-0.009 (0.016)		0.119** (0.014)		0.016 (0.016)			0.119** (0.039)
性别 (1 = 女性)	0.020 (0.026)	0.020 (0.026)	0.007 (0.023)	0.007 (0.023)	-0.115*** (0.026)	-0.114*** (0.026)	-0.035 (0.066)	-0.031 (0.066)
年龄	-0.010 (0.009)	-0.010 (0.009)	-0.001 (0.008)	-0.001 (0.008)	-0.026** (0.009)	-0.025** (0.009)	0.048* (0.023)	0.050* (0.023)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婚姻状况 (1 = 已婚)	0.105** (0.039)	0.106** (0.039)	0.075* (0.034)	0.074* (0.034)	-0.065+ (0.039)	-0.066+ (0.039)	0.437*** (0.097)	0.434*** (0.097)
教育程度 (参照群体: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23 (0.042)	0.023 (0.042)	0.126*** (0.037)	0.126*** (0.037)	0.126** (0.042)	0.126** (0.042)	-0.043 (0.105)	-0.044 (0.105)
高中 / 中专 / 技校	0.005 (0.046)	0.005 (0.046)	0.183*** (0.040)	0.182*** (0.040)	0.231*** (0.046)	0.231*** (0.046)	-0.101 (0.114)	-0.104 (0.114)
大专及以上	0.102+ (0.053)	0.102+ (0.053)	0.179*** (0.046)	0.180*** (0.046)	0.247*** (0.053)	0.248*** (0.053)	-0.513*** (0.132)	-0.505*** (0.132)
收入 (对数)	-0.022** (0.009)	-0.022** (0.009)	0.006 (0.006)	0.006 (0.006)	0.009 (0.009)	0.009 (0.009)	-0.028 (0.028)	-0.027 (0.027)

户口 (1 = 非农业户口)	(0.008) -0.115*** (0.030)	(0.008) -0.116*** (0.030)	(0.007) 0.064* (0.026)	(0.007) 0.065* (0.026)	(0.008) 0.060* (0.030)	(0.008) 0.062* (0.030)	(0.020) -0.481*** (0.074)	(0.020) -0.470*** (0.074)
管理职责 (参照群体: 只管理别人, 不受别人管理)	0.234*** (0.061)	0.233*** (0.061)	-0.043 (0.054)	-0.041 (0.054)	-0.060 (0.061)	-0.058 (0.062)	-0.265+ (0.154)	-0.249 (0.154)
既管理别人, 又受别人管理	0.102+ (0.056)	0.101+ (0.056)	-0.128** (0.048)	0.126** (0.048)	-0.267*** (0.056)	-0.265*** (0.056)	-0.009 (0.139)	0.003 (0.139)
只受别人管理, 不管理别人	0.104+ (0.057)	0.104+ (0.057)	-0.093+ (0.049)	-0.092+ (0.049)	-0.279*** (0.057)	-0.278*** (0.057)	0.040 (0.142)	0.044 (0.142)
既不管理别人, 又不受别人管理								
工作单位类型 (参照群体: 党政机关)								
企业	-0.013 (0.064)	-0.012 (0.064)	0.062 (0.056)	0.060 (0.056)	0.030 (0.064)	0.029 (0.064)	-0.370* (0.160)	-0.381* (0.160)
事业单位	0.038 (0.070)	0.039 (0.070)	0.073 (0.061)	0.071 (0.061)	0.096 (0.070)	0.094 (0.070)	0.070 (0.176)	0.058 (0.176)
社会团体	-0.011 (0.095)	-0.009 (0.095)	0.025 (0.083)	0.021 (0.083)	-0.102 (0.095)	-0.105 (0.095)	0.650** (0.239)	0.624** (0.239)
无单位/自雇/自办(合伙)企业	0.002 (0.071)	0.003 (0.071)	0.020 (0.062)	0.017 (0.062)	0.036 (0.071)	0.034 (0.071)	-0.077 (0.177)	-0.092 (0.177)
截距	3.019*** (0.211)	3.004*** (0.212)	2.146*** (0.184)	2.178*** (0.185)	3.311*** (0.211)	3.338*** (0.212)	3.293*** (0.528)	3.490*** (0.532)
R ²	0.027	0.027	0.055	0.055	0.117	0.117	0.069	0.071
n	3,946	3,946	3,934	3,934	3,942	3,942	3,946	3,946

注: (1)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边检验);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3 展示了衡量超时工作对健康影响的有序逻辑回归模型结果，对假设 2 进行检验。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上，模型 5a 的结果表明，超时工作对于各类群体自评健康的平均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在加入交互项后（模型 5b），超时工作对于不同阶层人群的自评健康显示出明显差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结果可联系作者索取），在回答“很健康”的被访者中，随着人们所处社会阶层的提高，超时工作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从负相关逐渐转变为正相关关系。对于其他回答的被访者，高阶层群体中超时工作更易造成负面的健康后果，低阶层群体中超时工作则与更积极的健康效果存在正相关关系。模型 6a 的因变量为过去四周中是否由于健康问题影响了工作和活动能力，相比模型 5a 中一般性的自评健康，该变量的模糊性更低。根据模型 6a 和 6b，超时工作对个体的活动能力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b = -0.200, p < 0.01$ ），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所在阶层的调节（ $b = 0.093, p < 0.05$ ）。与对自评健康的作用相似，那些工作和活动能力从未受到健康问题影响的群体中，超时工作在高阶层群体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小，对低阶层群体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对于其他活动能力不同程度受到健康问题困扰的被访者，超时工作的高阶层群体活动能力更易受损，非超时工作的低阶层群体活动能力更易受损（结果可联系作者索取）。模型 7a 和 7b 的结果表明，超时工作者的抑郁水平更高（ $b = 0.360, p < 0.001$ ），且不存在阶层差异（ $b = 0.009, p > 0.1$ ）。假设 2 得到了支持。

表 3 超时工作对健康影响的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自评健康		活动能力		抑郁水平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模型 6a	模型 7b
超时工作	-0.015 (0.070)	-0.356+ (0.188)	-0.200** (0.071)	-0.614** (0.192)	0.360*** (0.068)	0.322+ (0.184)
阶层	0.133*** (0.020)	0.100*** (0.026)	0.078*** (0.020)	0.037 (0.027)	-0.149*** (0.020)	-0.153*** (0.026)
超时工作 × 阶层		0.077+ (0.039)		0.093* (0.040)		0.009 (0.039)
控制变量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分割点						
分割点 1	-5.927*** (0.558)	-6.064*** (0.562)	-7.014*** (0.586)	-7.187*** (0.591)	-0.019 (0.511)	-0.034 (0.516)
分割点 2	-3.783*** (0.525)	-3.918*** (0.530)	-5.097*** (0.545)	-5.269*** (0.550)	1.785*** (0.512)	1.770*** (0.516)
分割点 3	-2.182*** (0.522)	-2.316*** (0.527)	-3.627*** (0.539)	-3.796*** (0.545)	3.447*** (0.515)	3.432*** (0.520)
分割点 4	-0.120 (0.521)	-0.252 (0.526)	-1.509** (0.537)	-1.676** (0.542)	5.594*** (0.547)	5.578*** (0.552)
Log likelihood	-4496.273	-4494.357	-4008.116	-4005.420	-4670.499	-4670.474
<i>n</i>	3,944	3,944	3,934	3,934	3,936	3,936

注：（1）***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边检验）；
（2）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4 中的模型分别检验了超时工作对亲环境行为（假设 3）和社会分配公正性评价（假设 4）的影响。规模效应和成分效应都发现更长的工作时间会造成负面的环境后果，模型 8a 支持了假设 3，平均来看，每

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最长的 51 个小时的劳动者亲环境行为频率更低 ($b = -0.052, p < 0.001$)，同时不存在阶层的调节效应。模型 9a 到模型 10b 的结果显示，各阶层的超时工作者都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更低，对政府公共服务均衡性更加不满，假设 4 得到证实。

最后，综合表 2 到表 4 的结果，不同阶层群体在超时工作对邻里交往、自评健康和活动能力的影响上存在差别，但在其他模型中没有明显差异，假设 5 得到了部分证实。

表 4 超时工作对亲环境行为、收入差距评价和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影响结果

	亲环境行为		收入差距评价		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	
	模型 8a	模型 8b	模型 9a	模型 9b	模型 10a	模型 10b
超时工作	-0.052*** (0.012)	-0.063* (0.032)	-0.528*** (0.107)	-0.700* (0.282)	-0.372*** (0.097)	-0.312 (0.260)
阶层	0.013*** (0.003)	0.012** (0.004)	0.157*** (0.030)	0.140*** (0.039)	0.140*** (0.027)	0.145*** (0.035)
超时工作 × 阶层		0.003 (0.007)		0.039 (0.059)		-0.013 (0.054)
控制变量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截距	1.313*** (0.090)	1.317*** (0.090)				
分割点			-2.188** (0.792)	-2.255** (0.799)	-1.975** (0.731)	-1.975** (0.734)
分割点 1			0.577 (0.790)	0.510 (0.797)	0.975 (0.726)	0.992 (0.730)
分割点 2					2.348** (0.728)	2.365** (0.731)
分割点 3					5.320***	5.338***

分割点 4					(0.747)	(0.751)
R ²	0.196	0.196				
Log likelihood			-1693.295	-1693.077	-2459.465	-2459.435
n	3,946	3,946	1,809	1,809	1,968	1,968

注：(1)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边检验)；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了修正上面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我们在表 5 中展示了倾向值匹配后干预组的平均干预效应，研究结果与上述模型基本一致。

表 5 倾向值匹配结果

变量	超时工作	标准误	n (超时工作者)	n (非超时工作者)	n
社会信任	-0.023	(0.030)	1,579	2,367	3,946
社会交往 (亲戚)	-0.087**	(0.029)	1,574	2,360	3,934
社会交往 (朋友)	-0.082*	(0.035)	1,578	2,364	3,942
社会交往 (邻居)	-0.137+	(0.079)	1,579	2,367	3,946
自评健康	-0.005	(0.036)	1,579	2,365	3,944
活动水平	-0.079**	(0.030)	1,574	2,360	3,934
抑郁水平	0.139***	(0.035)	1,575	2,361	3,936
亲环境行为	-0.040**	(0.015)	1,579	2,367	3,946
收入差距评价	-0.171***	(0.044)	717	1,092	1,809
政府服务均衡性评价	-0.153***	(0.046)	792	1,176	1,968

注：(1)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边检验)；
(2) 括号内为使用自助抽样法获得的标准误。

五、讨论和总结

近年来, 超时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时间社会学研究发现, 在现代社会, 工作时间的标准化和商品化彻底了重塑了人们的社会时间, 时间不断加速的趋势还引发了普遍的压力和经验贫乏。劳动控制理论更加细致地阐释了多种控制手段下劳动者如何或主动或被动地拉长了工作时间, 自我过量卷入到工作中, 造成意义感的丧失。虽然现有文献对于超时工作在影响个体时间使用上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但仍然缺乏全面的实证检验。更重要的是, 大多数研究主要仍然集中在工作场域, 忽视了超时工作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影响, 亟待挖掘广泛存在的超时工作现象如何通过侵占个体时间进而影响社会生活有序开展。本研究基于时间社会学和劳动控制的理论框架, 认为超时工作在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者逼仄、异化的时空体验, 从而产生超越阶层的、阻碍个体自我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普遍性社会后果。

与现有的理论预测一致, 对全国随机样本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值匹配结果表明, 过长的工作时间压缩了劳动者的生活时间, 在其他休息和从事休闲活动时仍然投身在工作中, 与他人时间无法同步。首当其冲的后果就是非工具性的社会交往的减少, 特别是与亲戚和朋友等能够提供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群体的沟通和联系。其次, 工作时间的延长使人们无暇进行健康管理, 睡眠和饮食等身体休整时间受到侵占, 滋长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生理健康造成了损害。超时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严密劳动控制的结果, 劳动者缺乏对工作过程和时间边界的把握。工作场域中的工具理性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引发了疲惫和抑郁的情绪体验。第三,

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裹挟下,人们将休闲等同于消费,耗时间更少、更具有社会地位识别性的炫耀性消费大行其道,不利于可持续消费的实现。此外,劳动者被长时间投入在工作里,环境保护这种耗时间精力、短期内无法看到个人收益的活动自然成为“奢侈品”,环境参与明显减少。最后,弹性化的时间结构下的超时工作让个体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很难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加剧时间使用的不公平感,使劳动者质疑社会经济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对于个体而言,超时工作制度下工作成为生活的重心甚至全部,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工作之外的生活几乎被吞噬,难以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劳动者被异化资本增值的工具,在日复一日的过度竞争、科层制支配和自我剥削的劳动控制过程中,时间压迫感和无力感成为常态,作为人的丰富面向被压制,无法建立起有意义的社会联结,享受生活、服务社会更成为奢望。在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上,由于在诸多行业都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工作时间的延长不再成为孤立的个体境遇,而是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个体社会资本的削弱在宏观层面上累积,可能造成休闲性互动和公民社会参与减少、普遍性互惠准则丧失、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等诸多负面后果。超时工作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损,代价也主要由个体和社会(而非作为主要受益者的雇主和工作单位)承担,人们受到病痛困扰之余,也使社会上弥散着健康焦虑,还增大了公共卫生健康支出的压力。亲环境行为是个体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超时工作占用了人们从事环保行动的时间和精力,对垃圾分类等政府推动的环保行为缺乏内生动力,更勿论其他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不利于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负面评价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对个体、政府和市场环境的不满,这可能是负面情绪的宣泄,但同时也可能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们的认知框架,形成社会性的不安全感,在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

本文还重点讨论了超时工作后果的阶层差异,研究表明,对于不同阶层的群体,超时工作基本上造成了类似的社会性后果。每天 24 小时的时间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动机如何,只要参与了超时工作,就会对工作之外的社会时间造成挤压。更重要的是,以往对超时工作的研究中,可测量的时间遮蔽了背后两点一线的空间,事实上,时空的连续性决定了以“996”为代表的超时工作不仅仅反映了时间的挤压,还意味着有限的互动情境(安东尼·吉登斯,2016),人的身体和精神所处的空间也受到同等的规制(米歇尔·福柯,2003)。在时间约束下,空间的延伸看似广阔,但都围绕工作这一工具理性的内核展开。长期超时工作的劳动者虽然身为加班集体的一员,实则暴露在孤独和脆弱的个体化情境中。人们在工作之外的需求越来越丰富,但却不得不被压缩在越来越少的休闲时间里。在这种意义上,除非权力的拥有者能够完全彻底地摆脱超时工作,否则也会被反噬,成为超时工作的牺牲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在本质上还是对相关性的探讨,因此对超时工作影响各个因变量的具体机制主要是基于理论探讨,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实施了一些缩短工作时间的社会实验,例如冰岛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对 2500 余名劳动者进行了每周四天工作日的实验,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 35 到 36 个小时,薪酬不变,专家评估结果显示,缩短工作时间对劳动者和雇佣者都产生了“革命性的积极效果”,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更高,压力更小,工作家庭的平

衡得到明显改善。未来可以通过细致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结合纵贯性数据，更深入地理解超时工作的影响机制。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超时工作带来的影响，但没有考察综合计算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等多种工时制度的影响。这些工时制度与标准工作时间的差异也容易造成劳动者在协调社会时间上的偏离感和不确定感，引发健康和社会后果。最后，囿于篇幅所限，本文重点探讨了超时工作对劳动者个体的影响，对于微观层面上的效应如何在宏观层面上产生影响只进行了累加性的估计，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通过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多种多样的互动产生更加复杂的结果，这也需要结合宏观数据继续分析。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2016). 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波德莱尔(2008).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陈龙(2020).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 社会学研究, 35(6), 113-135+244.
- 成伯清(2015). 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 江海学刊, (5), 100-106.
- 戴维·哈维(2013). 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丹尼尔·贝尔(2018).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哈尔特穆特·罗萨(2015).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哈里·布雷弗曼(1978). 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Jens Thoemmes、赵炜、沈妍辉(2020). 劳动社会学对工作时间的分析研究. 社会治理, (6), 55-60.
- 贾文娟、钟恺鸥(2018). 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 社会学研究, 33(6), 159-185+245.
- 李强、刘杰(2020). 在情怀之外: 互联网中小企业“自愿加班”的工厂政体研究. 社会发展研究, 7(1), 204-224+246.
- 李胜蓝、江立华(2020). 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 社会学研究, 35(6), 91-112+243-244.

- 林聚任、王兰（2015）. 时空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意蕴——社会建构论视角. 人文杂志, (7), 110-115.
- 刘程（2017）. 组织环境、劳动控制与青年劳工的精神健康. 青年研究, (5), 50-58+95.
- 刘欣、胡安宁（2016）.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社会, 36(4), 133-156.
- 麻宝斌、马永强（2019）. 公平感影响政府信任的绩效评价路径分析. 学习论坛, (4), 56-61.
- 马克思（201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2018）. 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1-3）.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斯·韦伯（2019）.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迈克尔·布若威（2008）. 制造同意（李荣荣译）. 商务印书馆.
- 米歇尔·福柯（2003）.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潘毅（2011）. 中国女工（任焰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 裴志军、陶思佳（2018）. 谁会给政府“差评”：社会资本和生活满意度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1), 98-103.
- 苏毓淞（2017）. 倾向值匹配法的概述与应用：从统计关联到因果推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田丰、孙正昕（2016）. 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 青年研究, (3), 11-20+94.
- 王宁（2013）. 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 山东社会科学, (9), 39-46.

- 王宁 (2015). 要钱还是要闲?——时间荒的文化根源. *中国休闲研究* 2015, 11.
- 魏钦恭 (2020).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社会*, 40(2), 204-240.
- 张辉 (2016). 不公经历与政府评价——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 的证据. *农村经济与科技*, 27(15), 263-265.
- 张抗私、刘翠花、丁述磊 (2018). 工作时间如何影响城镇职工的健康状况?——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劳动经济研究*, 6(1), 107-127.
- 郑广怀 (2010). 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 *社会学研究*, 25(6), 201-222+245-246.
- 郑作彧 (2018a).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 *学习与探索*, (1), 21-36.
- 郑作彧 (2018b). *社会的时间: 形成、变迁与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朱志玲 (2018). 矛盾遭遇对基层政府评价的影响——以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为中介变量.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3(5), 97-109.
- Afonso, P., Fonseca, M., & Pires, J. F. (2017). Impact of working hours on sleep and mental health. *Occupational Medicine*, 67(5), 377-382.
- Artazcoz, L., Cortès, I., Escribà-Agüir, V., Cascant, L., & Villegas, R. (2009).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long working hours with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related behaviour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63(7), 521-527.

- Bannai, Akira, & Tamakoshi, Akiko. (201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ng working hours and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40(1), 5–18.
- Barck-Holst, Peter, Nilsson, Åsa, Åkerstedt, Torbjörn, & Hellgren, Carina. (2017). Reduced working hours and stress in the Swedish social service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0(4), 897–913.
- Bartolini, Stefano, & Bilancini, Ennio. (2011).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ours Worked* (2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iena 62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iena.
-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irst Thus edition). Verso.
-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 Devetter, François-Xavier, & Rousseau, Sandrine. (2011). Working Hou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9(3), 333–355.
- Durkheim, Émil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Karen E. Fields, Trans.). Free Press.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chdr.). Basic Books.
- Fan, Wen, Lam, Jack, Moen, Phyllis, Kelly, Erin, King, Rosalind, & McHale, Susan. (2015). Constrained choices? Linking employees' and spouses' work time to health behavio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26, 99–109.
- Fitzgerald, Jared B., Schor, Juliet B., & Jorgenson, Andrew K. (2018). Working Hour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2013. *Social Forces*, 96(4), 1851–1874.

- Fletcher, Kathlyn E., Underwood, Willie, Davis, Steven Q., Mangrulkar, Rajesh S., McMahon, Laurence F., & Saint, Sanjay. (2005). Effects of Work Hour Reduction on Residents' Lives: A Systematic Review. *JAMA*, 294(9), 1088–1100.
- Guo, Shenyang, & Fraser, Mark W. (2015).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econd edition). SAGE.
- Helliwell, John F., & Putnam, Robert D.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1449), 1435–1446.
- Jin, Myung. (2013). Does Social Capital Promo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mplication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6(6), 397–407.
- Jorgenson, Andrew, Fitzgerald, Jared, Thombs, Ryan, Hill, Terrence, Givens, Jennifer, Clark, Brett, Schor, Juliet, Huang, Xiaorui, Kelly, Orla, & Ore, Peter. (2020). The Multiplicative Impacts of Working Hours and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US Stat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10117.
- Kasser, Tim, & Brown, Kirk Warren. (2003). On Time, Happines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s. In John De Graaf (Ed.), *Take Back Your Time: Fighting Overwork and Time Poverty in America* (pp. 107–112). Berrett-Koehler.
- Kauppinen, Timo, Toikkanen, Jouni, Pedersen, David, Young, Randy, Ahrens, Wolfgang, Boffetta, Paolo, Hansen, Johnni, Kromhout, Hans, Blasco, Jeronimo Maqueda, Mirabelli, Dario, Orden-Rivera, Victoria de la, Pannett, Brian, Plato, Nils, Savela, Anja, Vincent, Raymond, & Kogevinas, Manolis. (2000).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carcinogens in

- the European Union.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57(1), 10–18.
- Kivimäki, Mika, Jokela, Markus, Nyberg, Solja T., Singh-Manoux, Archana, Fransson, Eleonor I., Alfredsson, Lars, Bjorner, Jakob B., Borritz, Marianne, Burr, Hermann, Casini, Annalisa, Clays, Els, De Bacquer, Dirk, Dragano, Nico, Erbel, Raimund, Geuskens, Goedele A., Hamer, Mark, Hooftman, Wendela E., Houtman, Irene L., Jöckel, Karl-Heinz, ... Virtanen, Marianna. (2015). Long working hours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data for 603 838 individuals. *The Lancet*, 386(10005), 1739–1746.
- Knight, Kyle, Rosa, Eugene A., & Schor, Juliet B. (2013). Reducing growth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work hours. In Jeannette Wicks-Lim & Robert Pollin, *Capitalism on Trial* (52 citation(s); p. 14843).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Loh, Chung-Ping A. (2009). Physical inactivity and working hour inflexibility: Evidence from a U.S. sample of older men.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7(3), 257–281.
- Nyland, Chris.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513–534.
- Perlow, Leslie A. (1999). The Time Famine: Toward a Sociology of Work Tim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1), 57–81.
-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1), 1–24.
- Presser, Harriet B. (2003). *Working in a 24/7 economy: Challenges for American families* (1186).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 Schor, Juliet B. (1991).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Basic Books.
- Schor, Juliet B. (2005).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Worktime Reduc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9(1-2), 37-50.
- Simmel, Georg. (1903).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pp. 30-4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niguchi, Hiromi, & Marshall, Gul Aldikacti. (2018). Trust,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7(3), 385-410.
-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38, 56-97.
- Worrall, Les, & Cooper, Cary L. (1999). Working patterns and working hours: Their impact on UK managers.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1), 6-10.